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 勞動所得份額下降之探討*

李碧涵**、蕭全政***

收稿日期：2018年5月23日

接受日期：2018年8月2日

* DOI:10.6164/JNDS.201906_18(3).0001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E-mail: lbh@ntu.edu.tw。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E-mail: cjshiau@ntu.edu.tw。

摘 要

本文的主旨，在於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背景切入，探討全球勞動所得份額下降之原因及因應解決之道。本文首先指出各國實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策略下的勞動陷阱，即一方面是彈性勞動市場改革，卻伴隨著新科技的發展，而造成勞資關係個人化及工作外移；另一方面是金融資本當道和金融危機影響就業復甦和成長。本文接著分析勞動所得份額長期下降的全球圖像，包括全球勞動所得份額與實質薪資下降，以及金融自由化後資本報酬大增而壓縮勞動所得份額。本文進而探究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社會經濟後果，主要是全球工作貧窮問題持續和社會不平等擴大，以及全球風起雲湧的反新自由主義剝削勞工與社會不公運動。本文最後指出，要根本解決勞動所得份額下降與勞工就業與貧窮困境之道，在於各國必須追求勞資政一體的公平永續發展，不但各國要朝向改革式社會民主與經濟民主，以達到勞資公平分配，而且也要全面維護勞動力的工作能力與就業保障，才能達成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策略、金融資本主義、勞動所得份額下降、公平永續發展

壹、導論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夕，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工作報告早就發出全球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警訊，因為這代表在全球或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勞資雙方所得的分配不對等，勞方在所得分配中的那塊餅愈來愈小（Jaumotte and Tytell, 2007）。儘管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資本獲利短暫受挫，但其稍後又再創新高而使勞動所得份額仍然持續下降。ILO (2011, 2013) 和 OECD (2012, 2017) 也相繼指出全球勞動所得份額長期下滑的事實和趨勢，而且也呼籲此一議題必須得到更大的關注和更多的研究，因為其關乎勞工個人及家庭的收入與生活品質，也影響總體經濟層次的總需求，更牽涉相關社會群體的社會公平性，以及勞工因薪資等各種工作條件，而威脅其勞動和生活尊嚴。

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及 2010 年歐元區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以下簡稱歐債危機）後，全球勞動市場至今仍然深受打擊，很多國家經濟恢復成長後，就業與薪資卻仍處於一蹶不振的狀況。這一、兩年來，即使在北美與歐盟勞動所得份額或實質薪資已稍微回升，但全球到處是薪資停滯，可見金融危機與經濟不穩定，嚴重影響勞動市場能否蓬勃發展與勞動所得份額是否能夠提升。ILO (2011, 2016) 和 OECD (2017) 均指出，勞動所得份額下降其實是反映一體的兩面問題：一方面是勞動生產力成長速度高於平均勞動所得成長，另一方面則是資本報酬的增長高於勞動所得成長。

過去有關勞動所得份額的研究大多屬於經濟學領域的議題論述。Guerrero and Sen (2012) 提出勞動所得份額變動的跨國量化比較模型，認為影響國民所得中之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主要變項是全球化和技術進展；透過分析 1970 至 2009 年包括先進和開發中國家共 89 國資料，他們得到貿易開放和技術創新對於勞動份額具有正面且顯著影

響。Judzik and Sala (2013) 則根據美國、英國、日本、芬蘭、瑞典、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資料，發現若控制生產力成長變項，薪資長期下行趨勢是與各國工會密度下降，以及更開放的國際貿易有關。還有一份 IMF 的工作報告即指出，自 1990 年代全球勞動所得份額全面下降，雖然各國或各產業有不同的變動軌跡，但在先進經濟體是技術進展解釋了勞動份額的下降，而在發展中經濟體則主要是因為全球整合，尤其是全球價值鏈的擴張而導致資本密集生產的增加 (Dao, Das, Koczan and Lian, 2017)。

ILO 的一項研究 (Lavoie & Stockhammer, 2013) 也指出，過去 30 年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國全面採取資本導向成長策略 (capital-led growth strategy)，卻因而出現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嚴重問題；相對地，爲了提高勞動所得份額和達成經濟永續成長，他們建議必須實行工資導向成長策略 (wage-led growth strategy)。但本文認爲實行工資導向成長策略仍是不夠的，因爲勞動所得份額下降不只是勞工面臨的低薪問題而已。我們還要問：勞工從哪裡來？又哪裡去？前者關乎國家是否能提供充足的公共財，例如公共教育與全民健保，以造就高品質的勞動力，後者則是關乎勞工是否有充分的就業機會與保障。我們也要再問：勞工人擁有甚麼呢？所得？財產？企業分紅？這是關乎勞資雙方能否突破現有的對立關鍵，而轉變爲勞資結合的關係。而且勞動所得份額下降不僅是勞工本身面臨的問題而已，更是牽涉資方與政府，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例如，政府在面對資方與勞方時，是否只是偏袒資方，只重視經濟成長，而忽略勞資的平衡關係，以及勞工對資本積累的重要性。

Stiglitz 指出自 1980 年代新自由資本主義過度強調經濟全球化與國家解除管制，已形成國際金融機構的新式獨裁 (Stiglitz, 2002；李明 [譯]，2003)；Peck and Tickell (2007) 也提出如此全球化更加深全球和各國的經濟不穩定和危機。Boyer (1990, 1996) 主張必須變革新自由

主義全球化下自由市場導向的政府政策及獲利導向的企業作為，並強調非市場與市場力量必須相互結合，才能帶來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性與永續發展。Gordon, Edwards & Reich (1982) 則提出積累的社會結構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強調資本主義的長期和穩定成長是需要有一套制度形式、規則，或文化價值所組成的社會管制方式，或是制度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例如勞資關係、都市發展、社會制度和政府政策等。這些論點都根據 Polanyi (1944) 經濟的社會鑲嵌性 (social embeddedness of the economy) 概念，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發展不是只依靠市場機制，而是透過政治、社會和組織的制度安排。Block (1987, 1999) 也提出資本的多重邏輯 (multiple logics of capital) 觀點，主張資本並非只依市場邏輯而運作，經濟是結合國家行動 (state actions) 與經濟行動者 (例如企業) 之多重邏輯下的產物，故政治選擇 (political choice) 或政府政策，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本文將同時檢視勞動面和資本面問題，以及其牽涉的政府相關政策。本文認為勞動份額下降除了源自於勞動市場本身的制度變革，也與金融資本主義當道與金融危機息息相關。而且本文認為，要回應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問題，不能只限於經濟面向的探討，我們更須檢視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各國實行的經濟自由化和開放市場改革，及因而形成勞動市場的陷阱、勞動份額和實質薪資長期下降，以及工作貧窮和社會不公平分配的問題。

因此，本文的主旨，在於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背景切入，探討全球勞動所得份額下降之原因及因應解決之道。在導論之後，本文第貳章將指出各國實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策略下的勞動陷阱，即一方面是彈性勞動市場改革，卻伴隨著新科技的發展，而造成勞資關係個人化及工作外移；另一方面是金融資本當道和金融危機影響就業復甦和成長。第參章將分析勞動所得份額長期下降的全球圖

像，包括全球勞動所得份額與實質薪資下降，以及金融自由化後資本報酬大增而壓縮勞動所得份額。第肆章將探究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社會經濟後果，主要是全球工作貧窮問題持續和社會不平等擴大，以及全球新興的反新自由主義剝削勞工和社會不公抗議運動。第伍章將指出，要根本解決勞動所得份額下降與勞工困境之道，在於各國必須追求勞資政一體的公平永續發展，不但要朝向改革式社會民主與經濟民主，以達到勞資公平分配，而且也要全面維護勞動力的工作能力與就業保障，以達成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本文最後則是簡短的結論。

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策略下的勞動陷阱

早在 1960 年代，先進國家的製造業即因獲利率下降，而使產業開始全面自動化或外移至低勞動成本的開發中國家，並形成新的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NIDL）；但在歷經 19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所帶來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和嚴重的經濟衰退後，自 1980 年代開始，英國柴契爾政府和美國雷根政府共同提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策略，要求世界各國開放經貿、資本和勞動市場，並且由供給面干預經濟，給予企業減稅、免稅和融資等獎勵，以提升國際競爭力和促進全球自由市場的擴張（Conway and Heynen, 2006；李碧涵、蕭全政，2014）。經濟全球化雖然帶來各層面的跨國市場機會，但卻也同時造成各國諸多經濟及社會問題，甚至導致各種新的困境和危機。

1990 年代，OECD 各國為全面解除勞動管制，推動各種積極化措施（activation measures）和彈性勞動市場改革（flexible labor market reforms）；前者是政府積極協助失業者儘快重回勞動市場以縮減社會福利支出，而後者是政府鬆綁勞動管制以促成工資、工時和雇用型態彈性化。工作彈性化使工作不再限於典型的終身雇用和朝九晚五正職

工作，新的工作形態包括彈性工時、部分工時及臨時契約等非典型工作，但卻也造成非典型就業盛行及勞資關係個人化 (Drøpping, Hvinden & Vik, 1999；李碧涵，2002)。另外，各國也實行經貿自由化與解除資本和金融市場管制，但卻讓全球成為大賭場而形成賭場資本主義 (casino capitalism) 和金融資本主義 (finance capitalism) 當道；自 1990 年代後期，更因而一再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也影響企業聘雇和勞動市場復甦 (李碧涵、蕭全政，2014)。

一、彈性勞動市場改革伴隨新科技發展而造成勞資關係個人化及工作外移

OECD 各國在 1994 至 2004 年間進行勞動市場改革，即所謂的工作策略 (jobs strategy) 改革 (Brandt et., 2005)。OECD 國家工作策略改革強度前 15 名，依國家政策體制分，如表 1 所示。各體制勞動市場的主要改革內容，除了積極化措施之外，也呈現不同體制之間的差異：自由體制重視改革工資制訂與勞資關係、稅與社會安全提撥，或失業給付；北歐體制的改革重點，在於失業給付；歐陸和南歐體制之主要改革，在於稅與社會安全提撥、工時彈性，及退休與年金改革。

北歐社會民主體制因應 1990 年代經濟不景氣和高失業率，著手再商品化改革，勞資關係也由集中化的勞資政協商模式轉變為分權化的廣泛協商，且社會安全提撥與勞動市場參與直接掛勾 (Drøpping, Hvinden & Vik, 1999；李碧涵，2005)。英美等自由體制的彈性勞動市場改革在於工資彈性和就業形式多元化，以壓低勞動成本及提高企業競爭力，但卻形塑個人化勞資關係，且企業獲利時仍大舉裁員和縮減聘雇成本，完全為了推高股價和高層薪資。當前美國就業並非全面復甦，因其失業率降低是伴隨著勞動參與率下降 (由 2006 年的高點 66.2% 降至 2016 年的 62.8%)，有 1 千萬失業者甚至已完全退出勞動市場 (OECD, 2017)。

表 1 OECD 國家工作策略改革強度排名與主要改革項目

		工作策略 改革強度 排 名	工作策略改革與主要改革項目					
			積極化 政 策	稅與社 會安全 提 撥	失 業 給 付	工資制 定與勞 資關係	工 時 彈 性	退休與 年 金
自由 體制	澳 洲	7	✓			✓		
	愛爾蘭	9	✓	✓				
	英 國	11	✓	✓				
	加拿大	13	✓		✓			
北歐 體制	丹 麥	1	✓		✓			
	芬 蘭	3	✓		✓			✓
	瑞 典	9	✓		✓			
	挪 威	13	✓		✓			
歐陸 體制	荷 蘭	2	✓				✓	✓
	德 國	4	✓					✓
	比利時	6	✓	✓			✓	
	奧地利	8		✓	✓			✓
	盧森堡	15	✓	✓			✓	
南歐	義大利	5		✓			✓	✓
	葡萄牙	12					✓	

資料來源：Brandt et. (2005)；作者依國家政策體制加以分類並自行繪製。

註：打「✓」者為各國工作策略之主要改革項目。澳洲、愛爾、英國與加拿大屬自由體制，丹麥、芬蘭、瑞典與挪威屬北歐社會民主體制，荷蘭、德國、義大利、比利時、奧地利、葡萄牙與盧森堡同屬歐陸統合體制。

歐盟勞動市場改革包括：(1)鬆綁就業保護法規，讓僵化的勞動市場更具彈性化；(2)降低雇主支付之社會安全稅；(3)降低失業給付的所得津貼率或縮短給付期間；(4)工時彈性化並鼓勵雇用部分工時勞工；以及(5)鼓勵提早退休與縮減年金，但歐債危機後改為延後退休及請領全額退休金年齡（李碧涵，2002；李碧涵、蕭全政，2014）。德國實行工資和工時彈性化、縮減失業津貼，及強化就業服務以協助失業者找到工作等，這雖然使失業率下降，但實質薪資也下降且低薪工作盛行；

而南歐義大利勞動改革使勞工薪資無法成長（European Commission, 2016a）。

台灣彈性勞動市場改革始於 1996 年勞動基準法第一次修正；除因應勞方要求將服務業納入適用範圍（1984 年實施勞基法時只納入製造業），也依資方要求實施 4 週彈性工時，讓企業縮減雇用成本以增加獲利。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及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之際，在 2001 年由立法院通過勞基法新修正案，規定經工會或勞資會議通過，企業可實行 8 週或 1 年彈性工時；政府也提出加強就業服務和短期就業方案，而企業也跟進增加雇用非典型勞工（李碧涵，2002）；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台灣非典型就業持續增加。

當前各國非典型就業盛行，OECD 主要國家非典型勞工占總就業比率如表 2 所示。2016 年部分工時勞工占總就業比率以荷蘭 37.7% 居全球最高，其次為英國 23.8%、日本 22.8%，和德國 22.1%。同年，臨時性受雇者占比以韓國 21.9% 和荷蘭 20.8% 為最高。2014 年派遣勞工占比較高者是英國 3.9%、荷蘭 2.7%、美國 2.2%，和日本 2.0%。

上述各國彈性勞動市場改革不但弱化各國原有的勞動市場制度，而且使勞資關係走向個人化，這顯示在全球工會組織率下降以及團體協商制度式微。目前 OECD 國家工會組織率都呈現下降趨勢；台灣工會組織率由 1997 年的 23% 大幅下降至 2016 年新低點 7.3%；同期，日本由 22.6% 減至 17.3%，韓國由 12.2% 降至 10.2%；美國 1997 年工會組織率已達較低水準 14.1%，2016 年更降至 10.7%。歐洲工會組織率一向較高，德國 2013 年為 18.1%，同年義大利仍高達 37.3%（勞動部，2007，2017）。OECD 國家平均工會組織率在 1985 年為 30%，2015 年降為 17%；同期簽有集體協約的勞工也由 45% 縮減至 33%（OECD, 2017）。

而且，1980 年代全球化浪潮也伴隨著自動化以及資訊 / 通訊等新科技的發展，造成先進和新興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轉型和工作機會外移

表 2 OECD 主要國家非典型勞工占總就業比率

單位：%

	台灣	韓國	日本	美國	英國	德國	荷蘭	義大利	瑞典
部分工時勞工占總就業比率 (2016 年)	3.2	10.9	22.8	12.9	23.8	22.1	37.7	18.6	13.8
臨時性受雇者占總就業比率 (2016 年)	2.5	21.9	7.2	-	6.0	13.1	20.8	14.0	16.7
派遣勞工占總就業比率 (2014 年)	1.4	0.4 (2013)	2.0	2.2	3.9	0.4 (2013)	2.7	0.9	1.4

資料來源：勞動部 (2017)。作者自行繪製。

註：部分工時勞工 (part timers) 指主要工作經常性週工時未滿 30 小時，而全時受雇者 (full time employees) 指每週經常工時 35~40 小時。臨時受雇者 (temporary contractors) 主要指勞雇雙方訂定短期、定期契約 (數個月到 2~3 年)，契約中止則勞雇關係就終止；相對而言，永久受雇者 (permanent employees) 為核心員工，訂有不定期契約。機構派遣 (agency temporaries) 指派遣公司應要派公司要求，而將勞工派遣至要派公司工作，有三方就業關係。

至薪資較低的國家。台灣 1980 年代末也出現產業外移潮，企業以「台灣接单，海外生產」¹ 的三角貿易形式，在低勞動成本的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進行生產、出口和提高獲利率。這不但造成台灣產業沒有實質升級，而且企業外銷訂單成長都幾乎與台灣的生產脫節，無法帶動本土勞動雇用需求，還壓低本地勞工薪資 (朱敬一、康廷嶽，2015)。歐盟也因應全球化發展，於 2004 年由 15 國東擴成 25 國，產業或企業大量外移至先前的東歐國家，而造成歐元區國家勞工失業。²

當前資訊通訊和數位科技新發展已帶來第四次工業革命 (工業 4.0)，包括機器人和機械手臂、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雲端運

¹ 台灣 2015 年外銷訂單的海外生產比率高達 55.1%，2016 年為 54.2% (經濟部，2017)。

² 歐盟隨後於 2005 年成立全球化調整基金 (European Globalisation Adjustment Fund, EGF)，2007 年開始運作，積極協助因歐盟東擴與全球化而受害的產 (企) 業與勞工。

算、3D 列印，及數位平台等，完全改變了勞動技能需求，有利於高階而不利於中低階技能者（European Commission, 2016b）。OECD (2017) 指出，在 1995 至 2015 年間 OECD 35 個成員國的中階技術工作減少 9.5%，但新創工作機會呈現兩極化，高階技術工作增加 7.6%，低階技術工作增加 1.9%；而且全球勞動市場結構已完全改變，低薪和非典型工作增加。

二、金融資本當道和金融危機影響全球勞動市場復甦和成長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英美兩國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鬆綁金融管制，金融機構可同時經營銀行、投資和證券等業務，也開始發行高風險、高獲利衍生性金融創新商品（derivatives），³ 售予國內外投資者；英美也要求其他國家開放資本市場和金融透明化。但全球金融市場自由化卻帶來 1990 年代後期一連串的金融危機，包括 1995 年霸菱銀行事件和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等（Tickell, 2006; Peck and Tickell, 2007）。甚至在本世紀第一個年代由美國發生 2007 年次級房貸危機，並且造成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

在金融資本當道之下，企業治理的新形式是以高額獲利做為企業營運的最高原則，故採取嚴格的就業與薪資政策，包括精簡人事、削減薪資與退休福利，以極大化股利和股價。因此企業紛紛實行新雇用策略，縮減聘雇，壓低勞動成本，而使勞工的就業機會、薪資等工作

³ 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是要押注發展的方向，例如押注利率或匯率的變高或變低、證券包裹的企業營運變好或變壞等，而其報酬是以倍數計，虧損的倍數則更高。美國自 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後，採低利率政策貸款給企業，卻被大量投資於股匯市、房地產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銀行和證券商也以房貸做擔保而發行衍生性金融商品，如擔保債權憑證（CDO）和不動產抵押債券（MBS）等；也提供給信用較差之中下階層買房的次級房貸，利率較高且頭幾個月根本不用付房貸利息與償還本金（王鶴松，2009）。

條件，以及就業安全等各項發展都受到嚴重壓制（OECD, 2017）。

另外，金融資本主義造成的經濟與金融危機長期衝擊勞動市場。歐盟就業在全球金融危機後足足歷經 8 年、歐債危機後 6 年，直到 2016 Q3 才由 2009 至 2010 年及 2012 至 2013 年谷底翻身，小幅超過 2008 年高點，多了 94 萬（0.9%）；截至 2017 Q3，歐盟勞工工時仍然低迷不振，勞工現在有了工作但工時仍然嚴重不足（European Commission, 2016c, 2017, 2018）。

歐盟在全時就業方面，截至 2016 Q3 仍然低於 2008 年金融危機前最高點而少了 450 萬（2.4%）；但部分工時就業較少受危機影響且未曾式微，增加 430 萬（11.4%）。歐盟非自願部分工時就業比率由 2007 年的 23.1% 增至 2013 年的 30.4%，而男性非自願比率為 42.7%，高於女性的 26.8%；南歐希臘由 2007 年的 45.8%，飆高至 2014 年的 71.7%；義大利從 39.4% 增至 65.4%，西班牙由 33.6% 升至 64.4%。另外，歐盟永久就業在危機後更是難以復甦，2014 至 2016 Q3 的三年間才增加 208 萬人（1.8%）。臨時就業也受金融危機影響而緊縮，但 2014 至 2016 Q3 又增加 42 萬人（1.6%）（European Commission, 2016c）。因此金融危機對勞動市場形成長遠傷害，即使各國經濟恢復成長，但就業市場仍然無法全面成長。因為企業對經濟前景不看好，在企業信心不足之下，不會願意去雇用全時 / 永久勞工，新增就業機會很多都是部分工時或臨時性工作。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至今 10 年，OECD 國家失業率才剛回到危機前水準，就業率也才稍高於危機前水準，勞動市場的復甦相當緩慢，而且勞動市場安全惡化，低所得比率增加，只有性別勞動所得鴻溝稍有縮小（OECD, 2017）。ILO (2016) 指出 2010 年之後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已轉換成全球失業的增加；2015 年全球失業率為 5.8%，失業人口高達兩億，比起 2007 年還多了 3 千萬人。

參、勞動所得份額長期下降的全球圖像

自 1980 年代全球勞動所得份額和實質薪資均呈現長期下行趨勢，而且金融自由化帶來金融資本的高額獲利也壓縮勞動所得份額，茲依序分析如下。

一、全球勞動所得份額和實質薪資長期下行趨勢

ILO (2016) 比較 1995 年和 2014 年全球 133 個經濟體勞動所得份額的分配與中位數，發現全球勞動所得份額是不進反退；1995 年中位數為 0.55，2014 年降為 0.53。ILO (2011) 也檢視全球各區域的勞動所得份額歷史變動如圖 1 顯示；先進經濟體勞動份額自 1970 年代高點一路下滑，但在經濟不景氣的 1990 年代與 2000 至 2001 年，及 2009 年皆有短暫提升。亞洲（不含中國）勞動份額自 1985 年低點提升至 1996 年新高點，但 2007 年降至新低點。亞洲（包含中國）勞動份額也於 2007 年降至歷史新低。拉丁美洲勞動份額由 1990 年代初期達高點後，1996 年降至低點，之後有短暫回升，但 2005 年又跌至新低點，2006 至 2007 年則反轉上揚。

再以 20 國集團（G20）主要國家 1991 至 2013 年勞動所得份額而言，ILO (2015) 指出美國 1991 年勞動所得份額為 61.2%，2000 年網路經濟泡沫化後資本利得受挫而使勞動份額達新高點 61.5%；之後政府採取量化寬鬆和低利率政策，資本利得大增而且製造業加速自動化以提高獲利，且企業增加雇用低薪及非典型勞工，2013 年勞動份額降至歷史新低 56.4%。英國在本世紀勞動所得份額高於他國，2013 年為 62.3%；法國勞動份額在 57%~59% 上下；德國 2007 年勞動份額達歷史新低 55.1%，2013 年回升至 57.9%；日本 1991 年為 65.7%，2013 年下降至 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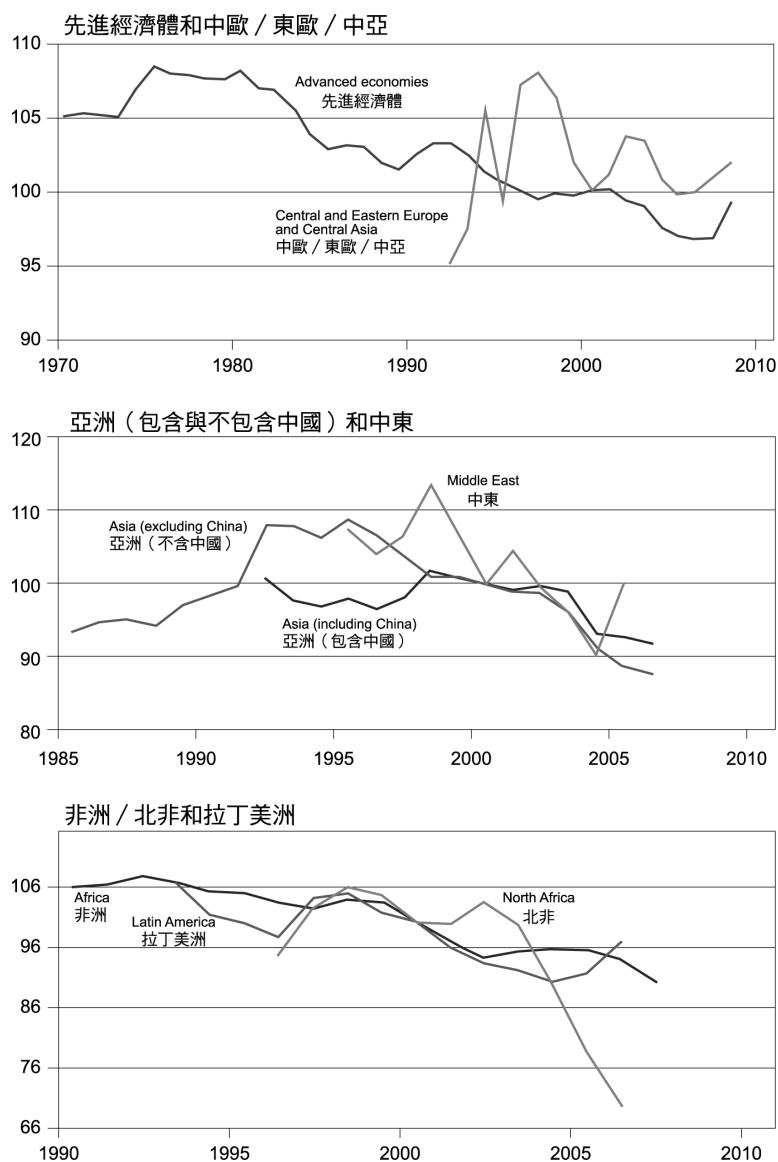


圖 1 勞動所得份額變動趨勢，依區域分 (2000 年=100)

註：中亞包括俄羅斯和土耳其；中東指科威特、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
資料來源：ILO (2011).

而台灣受雇人員報酬份額由 1990 年歷史高點大幅降至 2014 年和 2016 年歷史新低點 43.81%，只有於 2001 年、2008 年、2011 至 2012 年分別因網路經濟泡沫化和全球金融危機後資本利得受挫，而稍有提升，如圖 2 顯示。屬於資方的營業盈餘份額，卻由 1990 年的 29.80% 增高至 2015 年的 35.22% 和 2016 年的 35.0%。另外，屬於資方的固定資本消耗份額，則由 1990 年的 9.43% 上升至 2016 年的 15.60%，而同期屬於政府部門的生產及進口稅淨額由 9.73% 降至 5.58%（主計總處，2017a，201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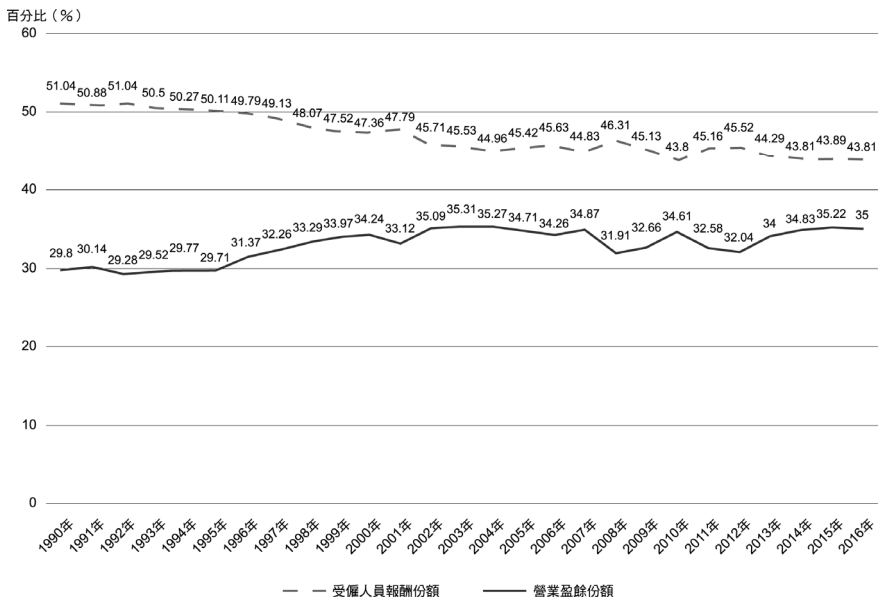


圖 2 國內所得（GDP）的受雇人員報酬與營業盈餘份額，1990 至 2016 年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2018a）。作者自行繪製。

上述全球或各國勞動份額提升常見於經濟危機或衰退時期，因資方利得受挫而致勞動份額短暫增加，但不一定代表勞動實質薪資上揚。

因此，本文進一步檢視全球實質薪資狀況。ILO (2016) 資料顯示 2006 至 2015 年全球實質薪資成長深受經濟與金融危機衝擊，如圖 3 顯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全球年均實質薪資成長在 2007 年高達 3.4%，若不含中國仍有 2.6%；但危機後全球薪資成長率在 2008/09 年只有 1.5%~1.6%，不含中國則更低為 0.6%~0.7%。全球薪資成長率在 2012/13 年回升 2.5%，不含中國為 1.6%。但之後受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和全球經貿滑落等因素影響，2015 年全球薪資成長率又降為 1.7%，不含中國則只有 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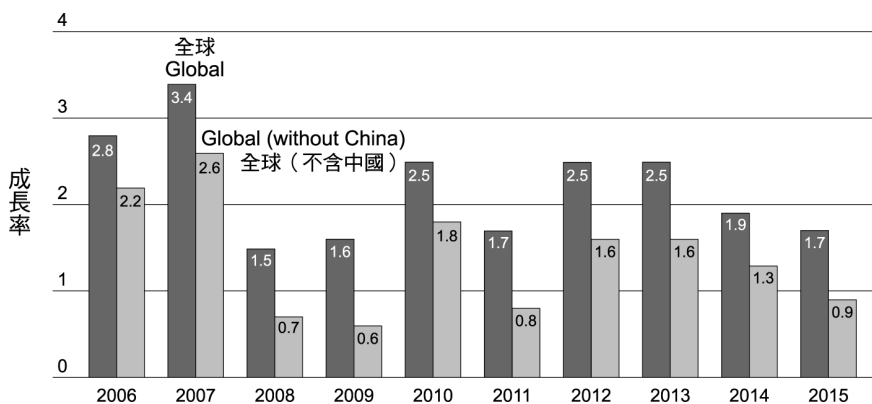


圖 3 全球年均實質薪資成長，2006 至 2015 年

資料來源：ILO (2016).

台灣 2006 至 2016 年每人每月實質（總）薪資平均年成長率為 0.0236%，比同期南韓 1.5755%、日本 0.8136%、美國（2008-2016 年）0.5377%、加拿大（2007 至 2010 年）0.7500% 都低，甚至比英國薪資平均年成長率 0.0645% 還更低，如表 3 顯示。主計總處（2017b）資料顯示，2016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含外籍勞工及部分工時受雇勞工）平均每人每月總薪資（含經常性薪資、獎金、紅利及加班費等）為 48,790 元，較 2015 年增加 0.62%；若扣除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1.40%，平均每人每月實質總薪資只有 46,422 元，年成長率為 -0.77%，比 2000 年的 46,605 元還低，實質總薪資倒退 16 年而形成薪資長期停滯及下降的問題。2017 年因有較高的經濟成長，使平均每人每月總薪資（49,989 元）、實質總薪資（47,271 元）及經常性薪資（39,953 元）都創歷年新高；但經常性薪資若扣除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0.62%，實質經常性薪資為 37,781 元（年增率 1.20%），仍低於 2000 年的 37,801 元，實質經常性薪資仍倒退 17 年（主計總處，2018b）。OECD (2017) 指出目前各國經濟成長即使恢復強勁，就業率也剛回到全球金融危機前水準，仍然無法與勞工產生連結，許多勞工薪資停滯或低薪，人民無感且民怨高漲。

表 3 主要國家工業及服務業員工每人每月實質薪資年增率

單位：%

年 別	台 灣	韓 國	日 本	美 國	加 拿 大	英 國
2006	0.16	3.44	0.06	2.34
2007	0.27	2.98	-1.72	...	2.18	2.62
2008	-3.45	...	-1.09	-1.00	0.42	0.01
2009	-4.10	-0.17	-3.58	1.74	1.21	-2.34
2010	4.16	3.71	1.35	1.05	1.76	-0.91
2011	1.15	-2.91	0.13	-0.50	-0.38	-2.12
2012	-1.72	3.08	-0.84	0.48	0.99	-1.41
2013	-0.62	2.52	-0.42	0.20	0.86	-1.39
2014	2.35	1.22	-1.85	0.81	0.73	-0.18
2015	2.83	2.73	-1.66	2.15	0.67	2.33
2016	-0.77	2.75	0.67	0.91	-0.94	1.76
2006-2016 年平均	0.0236%	1.5755%	0.8136%	0.5377%	0.75%	0.0645%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7）。作者自行繪製

二、金融自由化後資本報酬大增而壓縮勞動所得份額

自 1980 年代各國實行資本自由化，開放銀行與投資公司發行高風險、高獲利的創新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而推高金融業與高所得者之資本利得，使得資本所得份額加大。而且各國政府爲了振興經濟與追求更高的經濟成長率，更是傾全力獎勵產業升級的高科技製造業投資與金融服務業創新，因爲這些新產業可帶來高額獲利。

ILO (2011) 指出，不論在先進或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本世紀初都出現金融業資本所得份額成長率遠高於非金融業，如圖 4 所示。雖然先進經濟體的金融業的資本所得份額在 2007 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陡降，甚至低於非金融業，但在政府對金融業的立即紓困之後，2009 年又重新回到資本所得份額的高點。

再者，1980 年代不論高所得或中 / 低所得國家都大幅開放金融市場，而資本市場的高額獲利相對使勞動所得份額下降。ILO (2011) 指出在高所得國家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者，其勞動所得份額下降越多；在 1985 至 2005 年的 20 年間，高所得國家勞動份額年均下降幅度約達 0.35~0.6%，如圖 5 所示。同期在中 / 低所得國家，國際收支資本帳開放程度越大者，其勞動所得份額下滑越多，年均下滑約爲 0.4%~1.05%，且下降幅度比高所得國家更大。顯見各國金融自由化與勞動所得份額下降有高度關聯性。

台灣金融服務業自本世紀初也創造了高額營業盈餘，而成爲企業獲利之主要來源，也使得服務業成爲台灣經濟成長的引擎。游麗君 (2012) 研究顯示，服務業營業盈餘份額由 1990 年的 16.8% 大幅上升至 2010 年的 25.4% (同期工業營業盈餘份額由 10.2% 下降至 8.6%)，不過服務業的受雇人員報酬份額由 1990 年約 29.4% 只小幅上升至 2010 年約 30.3% (同期工業部門受雇人員報酬份額由 21.0% 陡降至 13.7%)。可見台灣服務業的高額獲利的確推高資本利得而使得勞動份額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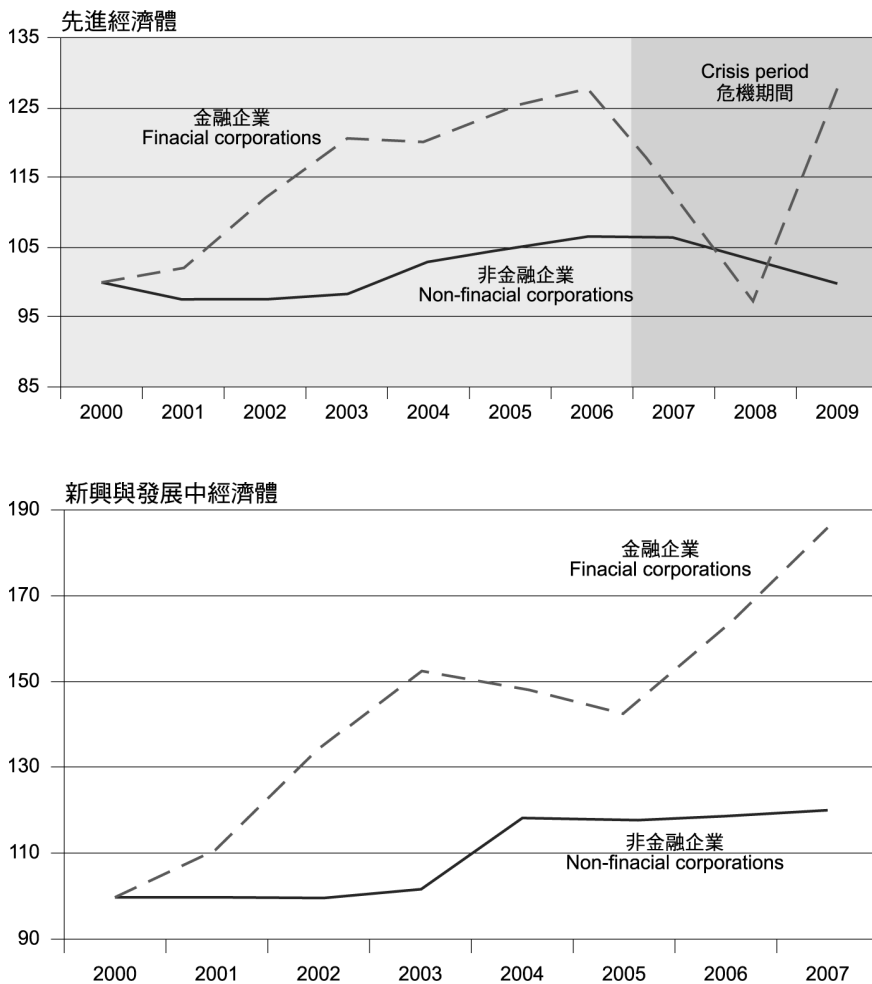


圖 4 先進和新興 / 發展中經濟體的資本所得份額成長率，依企業類型分，2000 至 2007/09 年 (2000 年 = 100)

資料來源：ILO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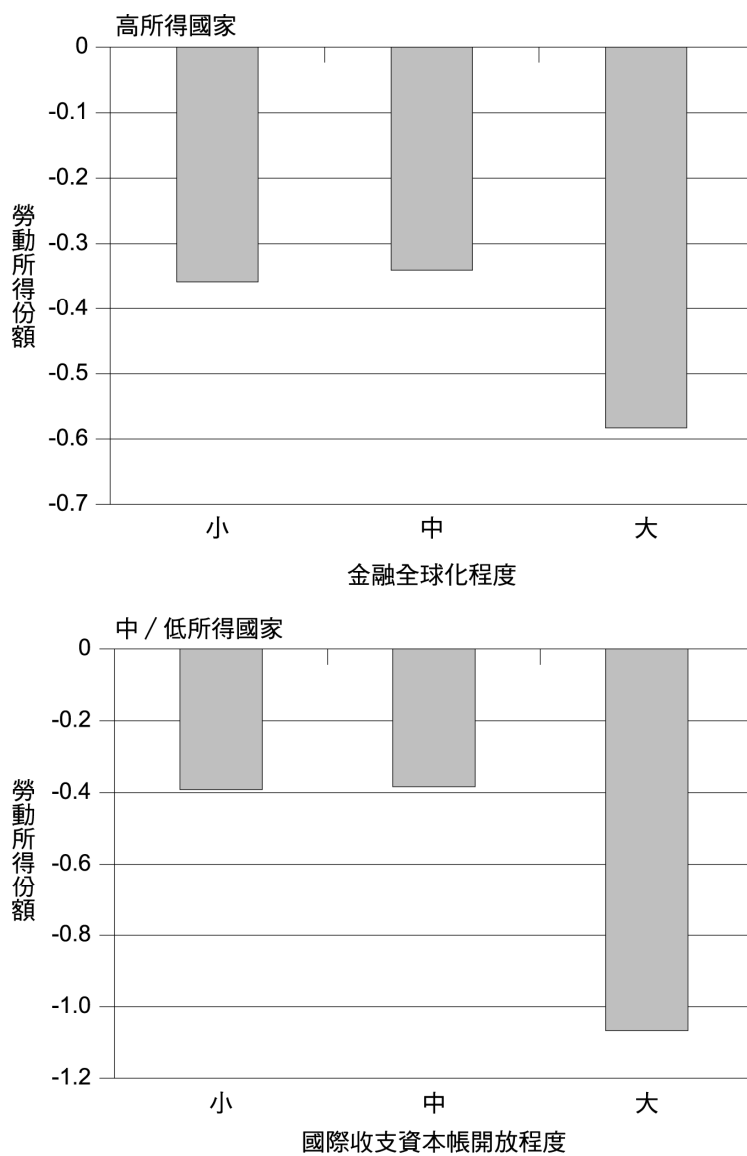


圖 5 高所得國家金融全球化程度及中/低所得國家國際收支資本帳開放程度與勞動所得份額年均成長率變動 (1985-2005 年)

資料來源：ILO (2011).

但是服務業盈餘份額攀高，對其受雇者薪資份額提升卻助益不大。

肆、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社會經濟後果

各國實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政策後，所帶來的經濟成長果實並未雨露均霑，而是很不公平的資源分配；而且各國政府在金融危機後也未適時提供完善的就業安全和社會安全網。其次，各國政府實行新自由供給面經濟政策，給予企業減稅、免稅、低利融資、出口或雇用補貼等各項投資獎勵，甚至超低稅率的非法甜心。但此舉侵蝕國家稅基，政府只好縮減公共支出和福利措施；而企業藏富，未分配盈餘攀升，卻又壓低勞工薪資，造成全球工作貧窮問題和社會不平等擴大，以及全球風起雲湧的反新自由主義抗議行動。

一、全球工作貧窮問題持續和社會不平等擴大

當前全球勞工面臨嚴峻的工作貧窮問題。ILO (2018) 指出在新興和開發中國家，工作貧窮問題持續且改善的步伐仍相當緩慢。在新興國家 2017 年工作貧窮率為 22.4% (約 5.4 億受雇勞工)，而在發展中國家更高達 67.4% (約 1.9 億受雇勞工)。在這些國家中有 11.2% 受雇勞工 (3 億) 處於極度工作貧窮 (extreme working poverty) 狀況，即勞工平均每天每人家戶所得或消費低於 1.90 美元，其中新興國家雖然在降低極端工作貧窮上有較顯著進展，但仍有 7.7% 勞工 (1.9 億) 為極度工作貧窮，而開發中國家則有高達 41.2% 受雇勞工 (1.1 億) 落入極度工作貧窮處境。在中度工作貧窮 (moderate working poverty) 方面，即勞工平均每天每人家戶所得或消費介於 1.90~3.10 美元間，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2017 年有平均高達 16% 受雇勞工 (總共有 4.3 億) 是處於中度工作貧窮，前者有 14.7% 勞工 (3.6 億)，後者有 26.2% 勞工 (0.7 億)。

同樣的，先進經濟體的歐盟也仍面對工作貧窮問題，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後情況更為惡化；失業、自雇、低薪、非典型暨低薪，以及典型暨低薪等勞工的工作貧窮率⁴ 都遠高於歐盟平均，如表 4 所示。歐盟勞動市場活動人口平均工作貧窮率由 2007 年的 14% 增高至 2014 年的 16%；同期 40~64 歲中高齡失業者由 44% 攀升至高達 51%；非典型暨低薪勞工工作貧窮率近年來也不斷上升，25~39 歲由 22% 增為 24%，40~64 歲由 22% 大幅增至 28%。此外，歐盟全體受雇

表 4 歐盟勞動市場活動人口工作貧窮率，2007-2014 年

單位：%

	年齡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All 全部	25-39	14	14	14	15	16	15	16	16
	40-64	14	14	14	14	15	15	16	16
Unemployed 失業	25-39	42	44	44	42	44	44	42	43
	40-64	44	47	49	50	50	50	51	51
Employed 受雇	25-39	7	8	8	8	8	8	8	9
	40-64	9	9	9	8	9	9	9	9
Self-employed 自雇	25-39	20	20	22	22	23	21	23	24
	40-64	21	20	20	20	22	22	22	22
Low-wage 低薪	25-39	20	21	17	18	18	19	20	20
	40-64	21	21	19	19	21	21	22	23
Non-stand & low-wage 非典型暨低薪	25-39	22	24	19	22	22	24	24	24
	40-64	22	22	22	21	24	24	27	28
Non-stand & non low-wage 非典型暨非低薪	25-39	8	9	8	7	8	8	8	8
	40-64	10	10	8	8	8	9	8	9
Stand & low-wage 典型暨低薪	25-39	18	19	16	16	16	15	17	17
	40-64	22	19	18	18	19	18	18	20
Stand & non low-wage 典型暨非低薪	25-39	2	2	2	2	2	2	2	2
	40-64	3	3	3	2	3	3	3	3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⁴ 歐盟工作貧窮 (in-work poverty) 的定義是勞工工作超過半年，且年均家戶可支配所得低於全國家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 60%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b)；可參考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statistics_on_income_and_living_conditions_\(EU-SILC\)_methodology_-_in-work_poverty](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statistics_on_income_and_living_conditions_(EU-SILC)_methodology_-_in-work_poverty)。2018/03/12 檢索。

者之工作貧窮率雖已由 2014 年的 9% 降至 2015 年的 8.2%，但低薪和工時不足的問題仍然到處可見，勞工即使有工作仍不足以賺取足夠的所得，工作貧窮問題層出不窮。歐盟部分工時勞工比全時勞工有較高的工作貧窮率，尤其在部分工時就業不普遍或不受到保障的國家，部分工時勞工面臨更高的工作貧窮風險，其中最高的是保加利亞的 34.1%、葡萄牙的 29.6% 和羅馬尼亞的 29.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b)。

全球勞動所得份額長期下降的問題，顯示勞資長期的不對等分配，終而造成社會不平等擴大。ILO (2016) 就指出全球勞動所得份額下降是伴隨著全球各區域所得不均等惡化的趨勢，如圖 6 顯示。1995-2012 年全球各區域勞動所得份額都呈現負成長，而以拉丁美洲和歐洲與中亞地區下降幅度最大。同期各區域所得基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增加，表示所得分配更為不均，貧富差距擴大 (除拉丁美洲貧富差距是縮減之外)，而以亞太地區最為明顯。本文分別計算自國民所得和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得知同期台灣勞動所得份額下降達 0.0459 (1995 年勞動份額為 0.5011，2012 年降為 0.4552)，基尼係數增加 0.021 (1995 年基尼係數為 0.317，2012 年增為 0.338)；與圖 6 全球各區域變化較之，台灣勞動所得份額下降幅度遠大於亞太地區；基尼係數增高幅度雖屬於中度，但仍表示家戶所得分配日益惡化。

2018 年世界不平等報告提出，自 1980 年北美和亞洲所得不平等快速加大，歐洲則是溫和擴大，至於中東、撒哈拉非洲以及巴西等仍是所得高度不平等。1980 年全球所得底層 50% 只擁有 8% 的全球所得，但所得前 1% 卻掌握 16% 的全球所得；而 2016 年全球所得底層 50% 只稍增至擁有 10% 的全球所得，但所得前 1% 卻大幅增加而掌握 22% 的全球所得。美國所得底層 50% 在 1980 年擁有 21% 國民所得，2016 年大幅縮為 12%；同期西歐所得底層 50% 由擁有國民所得 24% 降至 22% (Alvaredo, Chancel, Piketty, Saez and Zucman, 2017)。而且，不論在已開發國家或新興經濟體，資本報酬率始終高於經濟成長率，而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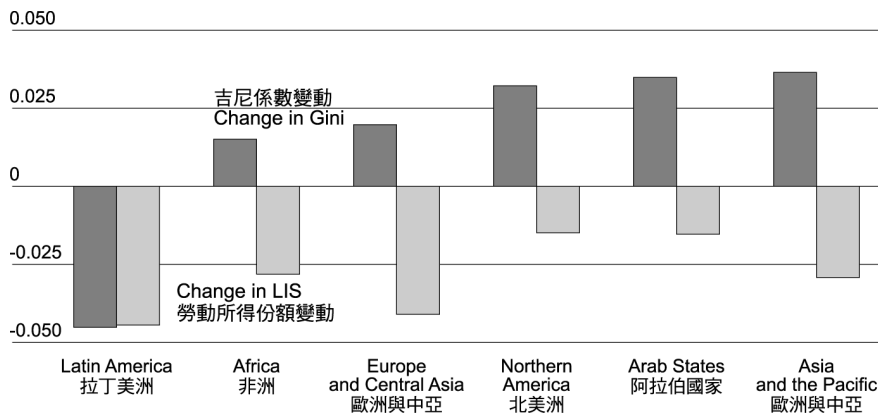


圖 6 所得分配不均等和勞動所得份額變化，1995-2012 年

資料來源：ILO (2016).

致財富集中和貧富不均逐漸擴大。Piketty (2014) 認為各國政府的金融政策與賦稅政策是最重要的導因，如政府給予資本的低稅率，又如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卻讓金融業有高額甚至不當的獲利機會，致使社會不均加大。

根據全球財富及所得資料庫 (The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簡稱 WID), 1981-2015 年各國頂端高所得者所得占國內所得比多呈現上升趨勢，各國所得高度集中在高所得者手中的情況日趨嚴重，如表 5 所示。以所得最高 1% 者所得占比而言，美國由 1981 年的 9.32% 升至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夕的歷史新高 22.56%，增加 13.24%；同期台灣也由 5.93% 升至 10.77%，增加 4.84%。就 2012 年所得前 10% 者所得占比而言，美國和南韓分別高達 47.80% 與 44.87%，日本為 41.57% (2010 年)，台灣雖較南韓低，仍達 38.22%。表 5 也顯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對頂端高所得者占比減少的影響只是短暫一、二年而已，之後主要國家高所得者所得占比甚至屢創歷史新高，美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表 5 主要國家高所得者所得占比，1981-2015 年

單位：%

年別	台灣			日本			美國			南韓		
	前10%	前5%	前1%	前10%	前5%	前1%	前10%	前5%	前1%	前10%	前5%	前1%
1981	23.64	15.63	5.93	32.52	21.32	8.52	32.25	21.60	9.32	28.63	19.29	7.14
1986	27.06	17.95	6.73	34.23	22.44	8.87	38.05	27.45	14.57	-	-	-
1991	29.29	19.86	8.05	37.87	26.03	12.14	37.01	26.06	12.66	-	-	-
1996	29.16	19.31	7.30	36.04	23.28	8.90	40.47	31.06	16.98	32.64	19.36	7.27
1997	29.32	19.51	7.53	35.92	22.92	8.40	41.72	31.06	16.98	33.37	19.80	7.49
1998	30.68	20.58	8.00	36.53	23.29	8.48	42.66	32.13	18.08	31.43	18.44	6.58
1999	29.70	20.01	7.90	37.28	23.86	8.74	43.71	33.25	19.11	33.45	19.90	7.55
2000	31.29	21.37	8.85	38.13	24.47	9.06	44.91	34.55	20.45	35.39	21.25	8.19
2001	32.54	22.25	9.15	39.59	25.36	9.38	42.16	31.38	17.24	36.25	22.07	8.55
2002	30.43	20.79	8.57	40.56	25.91	9.51	41.19	30.16	15.93	38.00	23.56	9.16
2003	30.99	21.42	9.19	41.21	26.47	9.80	41.82	30.79	16.58	38.69	21.10	9.22
2004	31.68	21.85	9.12	42.15	27.33	10.47	43.74	33.01	18.77	39.53	26.09	9.64
2005	33.40	23.22	9.88	42.43	27.77	11.04	45.71	35.25	20.92	37.78	25.62	9.96
2006	33.50	23.31	9.94	42.75	28.16	11.31	46.54	36.13	21.77	41.91	28.19	10.78
2007	35.28	24.76	10.77	42.96	28.26	11.35	47.19	36.89	22.56	42.39	28.49	11.28
2008	36.85	25.91	11.38	42.29	27.68	10.90	45.28	34.43	49.92	42.86	28.77	11.37
2009	33.71	23.31	9.66	41.31	26.94	10.42	43.53	32.02	17.17	42.60	28.57	11.33
2010	36.40	25.58	11.20	41.57	27.02	10.44	45.04	33.74	18.89	43.30	29.17	11.76
2011	37.64	26.55	11.74	-	-	-	45.14	33.73	18.65	44.22	29.86	12.25
2012	38.22	26.59	11.31	-	-	-	47.80	36.81	21.83	44.87	30.09	12.23
2013	36.93	25.25	10.68	-	-	-	45.64	34.25	18.96	-	-	-
2014	-	-	-	-	-	-	46.87	35.68	20.41	-	-	-
2015	-	-	-	-	-	-	50.47	-	22.03	-	-	-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2017c）。作者自行繪製。

二、全球反新自由主義剝削勞工與社會不公的抗議行動

自 1990 年代到 21 世紀初期，全球各地的勞工抗爭與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抗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政策帶來的勞工剝削與失業、貧窮、社會不平等、政商勾結，以及環境破壞等諸多問題。

首先，1994 年元旦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生效的同時，墨西哥南部奇亞帕斯塔省原住民組成反新自由主義洲際聯盟，而且在 1997 年會議後串聯奈及利亞、墨西哥、巴西和玻利維亞等國原住民、

勞工、農民、人權，和環保團體，針對全球化象徵的 WTO 而策劃全球抗議行動。1998 年 5 月底第一個全球行動日，全球有 28 國進行激烈的反 WTO 日內瓦部長會議的運動。1999 年 7 月 G8 峰會期間全民族反自由貿易暨世貿全球行動（PGA）組織發起全球反金融中心日，全球共有 40 國同時進行抗議行動（李碧涵，2004）。

1999 年 11 月 30 日反對 WTO 西雅圖部長會議的行動更是銳不可當，會場外有 15 萬人參與抗議，透過網路全球串聯而標示新世代行動主義崛起，形成美國自越戰後 30 年來最大型的社會運動。此抗議運動凸顯自由貿易的困境，因為新自由主義主張消除全球經貿壁壘，如關稅、勞動與環保法令等，以極大化企業利益；但抗議團體指出貿易自由化傷害工作權、社會權和環境權；自由貿易解決「成長」問題，但未解決「分配」問題。反 WTO 示威者不僅包括美國民主黨傳統票倉的鋼鐵、汽車、紡織工會，還有大學生、消費者、環保團體及主張支援窮國組織等，也包括代表第三世界的七七集團和來自各國的失業勞工和農民（李碧涵，2004）。

2000 年 4 月 IMF 和世界銀行（世銀）春季年會在華府召開，示威行動以全球正義大動員（Mobilization for Global Justice）號召全球各地 200 個團體參加，抗議 IMF 及世銀犧牲窮國及環保而執行符合富國利益的全球化開放市場政策，導致窮國愈窮及全球生態環境惡化。2000 年大赦聯盟也要求 IMF 和世銀勾銷全球 41 個最貧窮國家高達 2 千億美元的債務（李碧涵，2004）。

2001 年 1 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由反經濟全球化的各國非政府組織發起成立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抗議新自由主義導致的災難、社會不平等和不公不義。第四屆世界社會論壇於 2004 年在印度孟買舉行，提出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與經濟帝國主義，也使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在同年開會時，加以關注全球不平等及貧窮議題。在 21 世紀初期拉丁美洲各國反新自由主義運動

不斷抗爭社會不公和極端貧窮，而且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巴西等都出現左派政府上台，實行符合勞工和社群需求的免費教育和醫療政策（Conway, 2006; Grugel and Riggirozzi, 2012）。

另外，2007 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造成 2008 全球金融危機，而致全球經濟大幅衰退、勞工失業，以及社會不平等加劇，引發各國勞工和社會運動。南歐希臘、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還有愛爾蘭，都陷入政府債務危機，國家緊縮公共支出，著手社會經濟改革和退休金制度，但也引發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法國政府於 2010 年 6 月宣佈擲節方案改革退休金制度，引起工會號召學生走上街頭，抗議這項改革是因全球金融崩潰而變相懲罰勞工，對勞工不公平，也呼籲對銀行與富有階級加稅（自由時報電子報，2010）。而西班牙在 2011 年 5 月和 6 月有數萬民眾兩度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政府的經濟緊縮政策，造成人民失業和生活困苦（自由時報電子報，2011a，2011b）。義大利最大工會「義大利勞工總聯盟」（CGIL）於同年 9 月發動全國大罷工，數十萬勞工走上街頭抗議政府財政緊縮措施，要求政府捍衛工會成員工作權（中國時報，2011a）。比利時工會於 11 月在布魯塞爾證交所前發動「泡沫抗議」，要求政府不要讓勞工為經濟危機付出代價（中國時報，2011b）。

美國則更是自 2011 年 9 月 17 日在紐約市開始出現「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行動，抗議政府對銀行及大企業紓困、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擴大、政商勾結，及富人統治；抗議者說他們屬於 99% 的人，無法容忍另外 1% 華爾街的貪婪和腐敗（自由時報，2011）。10 月 5 日大紐約地區工會宣布加入，佔領華爾街行動成為大型示威抗議，上萬示威者要求政府改善貧富不均，解決企業肥貓現象（中央廣播電臺，2011）。10 月 15 日全球響應佔領華爾街行動，有 82 國民眾在團結改變全球網站號召下遊行示威。

在後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各國政府致力於企業紓困，而資本家和大部分經濟學家也繼續相信資本 / 市場力量。殊不知如此新自由主義

經濟成長是短視近利且無法永續的，更無法鑲嵌在總體社會，而只是某些少數人受惠，不利於勞工，也不利於全面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Stiglitz, 2012；羅耀宗〔譯〕，2013）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指出，美國經濟和政治體制從根本上就不公平，而分配不公是政治體系失能的因和果。史迪格里茲（Stiglitz, 2002；李明〔譯〕，2003）早就指出世銀最新研究發現是公平分配與經濟成長是可以兼顧的，而且較均等的政策更有利於成長。

伍、追求勞資政一體的公平永續發展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由英美兩國政府及全球經濟機構（如 IMF、World Bank 和 WTO 等）主導，並由各國政府聯合跨國與當地企業，而共同推展的由上而下的全球化，其發展策略過度強調市場開放與市場機會，以及政商關係緊密的結合，但卻完全壓制了勞工權益和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本文建議為根本解決薪資低落及勞動所得份額下降問題，不但在國際層次，各國國際經濟機構必須改變原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的做法（李碧涵、蕭全政，2014）；而且在各國國內層次，政府必須朝向改革式社會民主與經濟民主，勞資政三方才能成爲一體而達到勞資公平分配，而且各國也要注重維護勞動力的工作能力與就業保障，才能達成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本文接著提出相關具體做法。

一、朝向改革式社會民主與經濟民主，勞資政成爲一體而達到勞資公平分配

本文主張各國必須朝向改革式社會民主與經濟民主，才能完全平衡國家角色、資本／企業，以及勞工等各種社會群體三者之間的關係，也才可能根本改善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事實。社會民主與經濟民主事實上並沒有一定的形式，本文提出的朝向改革式社會民主與經濟民

主，並非全然如 1980 年代以前的北歐有全面性的高度國家介入經濟與社會，但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改革式資本主義，因為都仍保有個人財產權，只是著重社會平等與公平分配作為政府施政內容與目標，且強調市場、國家與勞工等社會群體三者之間有平衡的關係。

詳細言之，本文建議各國應著重改革式社會民主，強調國家(state)或各國政府必須扮演積極角色，要能適度介入經濟與社會，當政府面對資方和勞方時，如圖 7 所示，不能像當前新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下政府向資方 / 自由市場靠攏，實行偏向資方的供給面經濟策略，這可能形成不當且不透明的政商關係，而且忽略政府與勞工應有之關係。各國政府要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偏向資方的政策，轉向實行關照和保障勞方的改革式社會民主政策，重新重視勞工的工作權和其他社會權(如受教權、醫療權、居住權，和生活品質權等)，以及勞資所得重分配。各國政府應有的社會民主改革角色包括：(1) 監管過度的市場化，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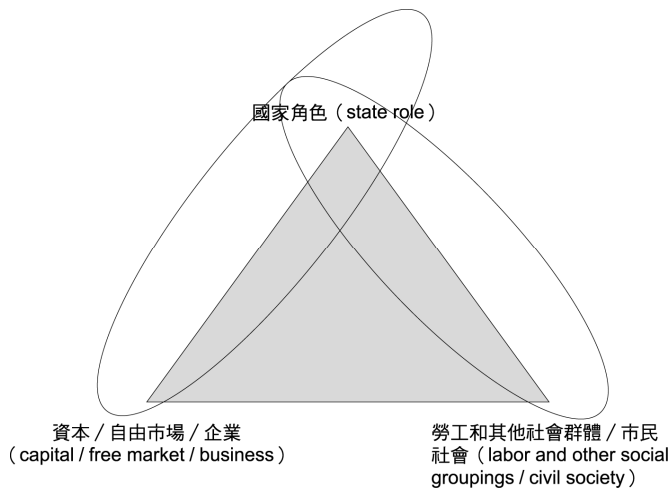


圖 7 各國政府同時面對資方(左圈)
與勞方和其他社會群體(右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經濟和社會，維護勞工的工作權並提供社會保障；(2) 提供公共財（教育和健保等），促成資源和機會均等；以及 (3) 所得重分配，實行累進所得稅率以達賦稅公平。但目前幾乎各國政府都提供企業或富人減稅、免稅或融資等獎勵措施，而且容許企業未分配盈餘增加時也不提高勞工薪資，勞工無法共享經濟成長果實；更甚的是，當企業享有減稅和海外藏富時，政府卻因國庫收入減少而轉向縮減社會福利並對人民加稅，這簡直是劫貧濟貧的做法。各國政府必須要能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權，開放市場的同時也要平衡社會發展。

其次，本文建議各國必須朝向實行勞資結合的改革式經濟民主，也就是針對勞資最根本的財產 / 財富所有權問題加以改革，讓勞工參與企業董事會的重要決策過程，且勞資共享企業所有權與營業盈餘，才能調和勞資對立關係，讓勞資雙方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如圖 8 所示，以徹底解決勞動所得份額下降問題。勞資對立問題在於經濟所有權的分配不公平，故必須朝向實行改革式經濟民主，讓勞資能共創企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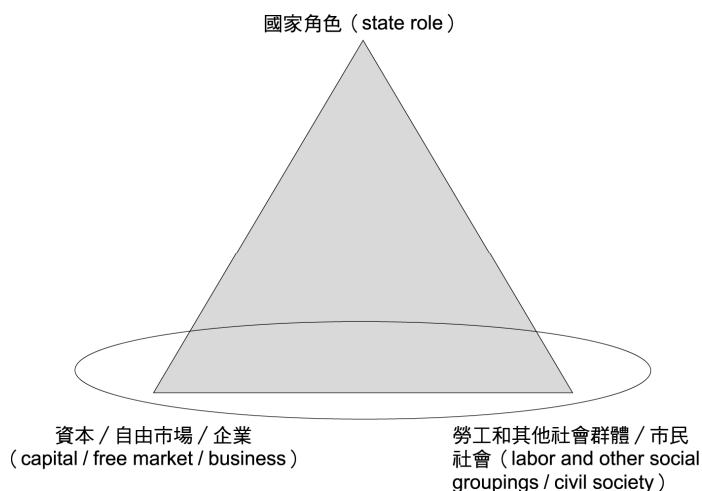


圖 8 資方與勞方兩者應有密切結合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共同認股，共享所有權和經營權，而且是嚴格守法的經營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SR）。如此勞資利益一致，而且透過不斷的勞資協商，勞資雙方結為一體，資方將營業盈餘與勞方共享，也提高工資，將可完全改善勞資對立，並提高勞工的所得和生活品質，進而維護勞動力。故企業不能再依靠壓低勞動成本而獲得高額利潤和企業競爭力，即不再只是追求降低成本的競爭性彈性，而是企業能透過勞資結合使雙方能共享企業營運果實，也重視維護高品質的勞動力。

二、全面維護勞動力的工作能力與就業保障，才能達成永續經濟社會發展

相對於資金無祖國而可在全球自由流動以尋求獲利機會，勞動市場卻是鑲嵌在地方與各國，勞工的全球移動性很有限，故需要各國政府保障其工作權。但是過去歷次金融危機已讓勞動市場無法完全回復過去的就業榮景，勞工常被壓低薪資甚或失業。加上自 1990 年代各國政府進行勞動法規鬆綁和彈性化改革，不但降低勞工的就業保障，而且勞動市場充斥低薪工作。

本文主張政府要注重勞動力的工作能力培養與素質提升，包括教育、健康和勞工技能等，而勞工不是只為資方獲利而勞動，勞工在工作中要能體現其專業價值與創意投入。故各國要因應新科技而提供勞動力再訓練與終身學習、各項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還有勞動力所需的各項社會服務，包括教育、訓練和健康照護等。誠如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認為自由市場要加以規範，否則企業享有完全自由市場，可能會用低薪雇用勞工；因此，制度安排，例如勞基法的勞資規範，就很重要。市場必須結合社會機會的擴展，即要透過制度保障與社會安排，才能確保勞工有立足點平等，以及就業和生活選擇的自由。而當前資本主義的市場分配導致貧富不均，教育、健康與所得不平等也都使個人機會受到限制。故政府要提供公共財，

讓個人有能力去工作或做其他事情（劉楚俊〔譯〕，2001；Sen, 1999；李碧涵、蕭全政，2016）。

其次，本文認為全球機構與各國政府要確實監管金融業的不當運作，以避免金融危機一再發生，造成經濟不穩定而長期危害勞工的就業與勞動力的維護。但是，例如美國總統川普甫上台就亟欲廢除對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嚴格監管的「陶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⁵（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而代之以鬆綁金融管制的「金融選擇法（Financial CHOICE Act）」（自由時報電子報，2017a）；研擬中的金融選擇法，將放寬對銀行的嚴格監管，以方便金融業對企業貸款，也讓金融業販賣衍生性金融商品給消費者，而不必透明化也不用承擔消費者保護責任（自由時報電子報，2017b）。這可能又重新形塑另一波的金融海嘯。事實上，資本／企業持續獲利和永續經營是要鑲嵌在社會總體之中，也要鑲嵌在全球與各地發展之上，但當前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卻是讓資本／企業獲利，逐漸與地方的社會發展脫鉤。各國大企業或跨國企業創造高額獲利後，藏富於全球低稅國家（tax havens，租稅避風港或俗稱避稅天堂），而不是藏富於民。資本主義經濟的永續發展是需要社會的整體發展，但我們回頭檢視現在世界各國的經濟成長狀況，都不是全面或永續成長，而只是某些部門的擴張或短暫性成長，例如金融部門或房地產的短期高度成長，或只是某些人的消費所帶動的成長，如富人的奢侈品消費。

另外，因應台灣勞動份額下降問題，政府應全力協助勞動力的終身學習與訓練，也要加強典型與非典型低薪就業者的就業安全與社會保障。例如前述荷蘭部分工時就業占總就業比率為全球最高，但其勞

⁵ 陶德金改法案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2009年1月甫上台時，面對2008年9月雷曼兄弟投資公司倒閉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交付國會在2010年通過長達2千頁的金融改革法案，預計將分數年實施，內容包括嚴格監管衍生性金融商品、銀行要謹慎審查貸款，和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Financial Times, 2017）。

動法規定若部分工時勞工係從事每周有一定工時的固定工作，得與全時勞工享有等比例的就業保障和企業福利。而相較於荷蘭對非典型就業者的多方保障，台灣空有勞動市場彈性（工時彈性和非典型就業），卻缺乏制定相關勞動法規加以規範非典型就業，也缺乏給予非典型就業者就業安全和社會保障（例如穩定就業、享有勞健保、退休提撥、失業津貼和企業福利等）。而且針對勞工薪資低落問題，政府與企業都有責任加以改善，一方面企業要願意投入大量資金於實體經濟的生產且積極從事產業升級創新之外，另一方面政府要鼓勵企業不只要提高薪資，更要願意將多一點盈餘分配給勞方，並提升勞工技能與增加雇用永久／全時員工而減少雇用非典型勞工，才可能維護高品質的勞動力。

陸、結論

本文的主旨，在於檢視 1980 年代至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勞動所得份額下降問題。其中，自 1980 年代美國雷根政府和英國柴契爾政府聯手在國內外推展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策略，強勢要求世界各國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開放資本、商品和勞動市場。

如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策略所造成的勞動陷阱，一方面是勞動市場彈性化改革伴隨著新科技，不但使勞動市場充斥低薪和非典型工作，更造成勞資關係個人化；另一方面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在各國和全球不但形成金融資本主義當道，而且造成多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嚴重影響勞工就業和薪資成長，並因而造成全球普遍性的勞動所得份額的下降。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夕，不論先進經濟體或亞洲和非洲，都出現勞動所得份額降至歷史新低，而資本所得份額攀升至歷史新高的局面。資本所得份額即使在金融危機時期有短暫下挫，隨後又一路上升，使勞動所得份額仍處於繼續下滑趨勢；而且金融自由化帶來金融資本

的高額獲利也壓縮勞動所得份額。

各國實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政策後，並未使多數勞工受益，反而造成勞工收入偏低與就業不安全，全球工作貧窮問題持續，而且社會不平等不斷擴大，全球各地也紛紛出現反新自由主義示威行動。而各國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全力給予企業減稅和紓困，但國家卻陷入財政危機，只能緊縮政府預算和削減社會福利，更無法適時提供完善的就業安全和社會安全網。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發展結果是勞工和政府都是輸家，只有資方是贏家，而資方只是社會中的少數人。如此非包容性成長模式（non-inclusive growth model）終究有其極限，因為總需求不能只依靠富人和資方，社會不平等加劇更會危害進一步的經濟成長。

本文主張各國政府不能只是一味的採取新自由主義供給面的經濟政策，而只有利於資方獲利，卻壓制勞方應有的發展；而是各國為解決勞動所得份額下降問題，必須朝向改革式社會民主與經濟民主，勞資政成爲一體，才能達到勞資公平分配，也必須要全面維護勞動力的創新能力與就業保障，才能達成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台灣勞動所得份額下降和低薪問題，除了企業要不斷從事產業創新和提升勞工技能之外，也端視國家能否體認勞動力對永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並主動改變偏袒資方的政策，轉向採取真正照顧勞工需求和平衡勞資關係的政策。

未來全球經濟機構和各國政府都要嚴格監管不當的金融操作，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而制約就業成長；勞動市場也要能完全復甦活絡，而非新增工作機會都幾乎只限於非典型或低薪工作。當科技不斷進步，人類永遠是創新發明新科技的主體，而創新與產業發展都需要高品質和具有創新能力的勞動力。各國應積極鼓勵勞資共同創業、研發，及共同享有企業盈餘。唯有勞資結合，加上政府能調和勞資關係，勞資政三方結爲一體，才能共創繁榮且公平永續的經濟社會發展。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中央廣播電臺 (2011)。〈「占領華爾街」上萬紐約客上街〉。http://news.rti.org.tw/index_friendlyPrint.aspx?nid=321449。2011/10/06 檢索。
- 中國時報 (2011a)。〈義財政緊縮 勞工上街爭權益〉，9月7日，A15版。
- 中國時報 (2011b)。〈抗議泡沫〉，11月10日，A5版。
- 王鶴松 (2009)。〈華爾街金融風暴與全球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金融危機》，頁53-83。台北：台灣金融研訓院。
- 主計總處 (2017a)。〈國民所得統計摘要 民國40年至105年〉。台北：主計總處。
- 主計總處 (2017b)。〈106年1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台北：主計總處。
- 主計總處 (2017c)。〈105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台北：主計總處。
- 主計總處 (2018a)。〈國民所得統計摘要，民國40年至106年〉。台北：主計總處。
- 主計總處 (2018b)。〈106年12月暨全年工業及服務業薪資與生產力統計結果〉。台北：主計總處。
- 朱敬一、康廷嶽 (2015)。〈經濟轉型中的「社會不公平」〉，《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1-22。
- 自由時報 (2011)。〈占領華爾街 美鎮壓逮80人〉，9月26日，A6版。
-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0)。〈法退休改革方案通過 恐激化罷工〉。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oct/24/today-int2.htm>。
2010/10/24/檢索。
-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1a)。〈西班牙爆大示威 恐撼執政黨地位〉。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499173&type=%E5%9C%8B%E9%9A%9B>。2011/05/22 檢索。
-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1b)。〈不滿高失業率 西班牙萬人上街抗議〉。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509400&type=%E5%9C%8B%E9%9A%9B>。2011/06/20 日檢索。
-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7a)。〈川普擬廢除陶德金改法案〉, 4月13日。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093690>。2018/03/12 檢索。
-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7b)。〈美公布鬆綁金融監管草案〉, 4月21日。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095947>。2018/03/12 檢索。
- 李明 (譯), Stiglitz, Joseph E. (原著) (2003)。《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台北: 大塊文化。
- 李碧涵 (2002)。〈勞動體制的發展: 全球化下的挑戰與改革〉,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6(1): 185-219。
- 李碧涵 (2004)。〈1990 年代經濟全球化對第三世界的影響: 巴西、墨西哥和印尼的個案分析〉, 《社會新天地》, 8: 21-31。
- 李碧涵 (2005)。〈福利國家向右走: 工作福利國家的創新性改革〉, 《2005 年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 社會暨健康政策的變動與創新趨勢: 邁向多元、整合的福利體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 頁 182-200。
- 李碧涵、蕭全政 (2014)。〈新自由主義經濟社會發展與分配問題〉, 《國家發展研究》, 14(1): 33-62。
- 李碧涵、蕭全政 (2016)。〈從制度觀點探討個體和性別的不平等〉,

- 《國家發展研究》，15(2)：43-90。
- 勞動部 (2007)。〈國際勞動統計 2007 年〉。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457/18352/。2018/03/12 檢索。
- 勞動部 (2017)。〈國際勞動統計 2016 年〉。台北：勞動部。
- 游麗君 (2012)。〈臺灣生產面要素所得份額之變動分析〉，《綜合規劃研究》，頁 389-420。台北：行政院經建會。
- 經濟部 (2017)。〈106 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台北：經濟部。
- 劉楚俊 (譯)，Amartya Sen (原著) (2001)。《經濟發展與自由》。台北：先覺文化。
- 羅耀宗 (譯)，Stiglitz, Joseph E. (原著) (2013)。《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台北：天下。

二、英文部分

- Alvaredo, Facundo, L. Chancel, T. Piketty, E. Saez and G. Zucman (2017). *Global Inequality Report 2018*. World Inequality Lab.
- Block, Fred (1987). "Political Choice and Multiple 'Logics' of Capital." In Fred Block, *Revising State Theory: Essays in Politics and Postindustrial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lock, Fred (1999).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yer, Robert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yer, Robert (1996). "State and Market: A New Engage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obert Boyer and Daniel Drache (eds.), *States against Markets: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pp.84-11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randt, Nicola, Jean-Marc Burniaux and Romain Duval (2005). *Assessing the OECD Jobs Strategy: Past Developments and Reform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429. Paris: OECD Publishing.
- Conway, Dennis (2006)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Coordinating Global Resistance, Alternative Social Forums, Civil Society and Grassroots Networks*. In Dennis Conway and Nik Heynen (eds.), *Globalization's Contradictions: Geographies of Discipline, De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212-225.
- Conway, Dennis and Nik Heynen (2006). *The Ascendancy of Neoliberalism and Emergence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n Dennis Conway and Nik Heynen (eds.), *Globalization's Contradictions: Geographies of Discipline, De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7-34.
- Dao, Mai Chi, Mitali Das, Zsoka Koczan & Weicheng Lia (2017). *Why Is Labor Receiving a Smaller Share of Global Incom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MF Working Paper No.17/169.
- Drøpping, J. A., B. Hvinden & K. Vik (1999). "Activation Polici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Mikko Kautto, Matti Heikkilä, Bjørn Hvinden, Staffan Marklund and Niels Ploug (ed.), *Nordic Social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pp.133-15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a). *Labour Market and Wage Developments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2016*.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b).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ESDE) 2016*.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c).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in Europe (ESDE) Quarterly Review*, Winter 2016.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ESDE) 2017*.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ESDE) Quarterly Review, February 2018*.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Financial Times (2017). Definition of Dodd-Frank Act. http://lexicon.ft.com/Term?term=Dodd_Frank-Act. Retrieved date: 2018/03/12.
- Gordon, David, R. Edwards and M.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ugel, Jean and Pía Riggirozzi (2012) Post-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Rebuilding and Reclaiming the State after Cri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3(1): 1-21.
- Guerriero, Marta and Kunal Sen (2012). *What Determines the Share of Labour in National Income?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DP No. 6643. Bonn, Germany: IZA.
- ILO (2011). *World of Work Report 2011: Making Markets Work for Job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3). *Global Wage Report 2012/13: Wages and Equitable Growth*.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5).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Wage In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8).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8*.

-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Jaumotte, Florence and Irina Tytell (2007). *How Has the Globalization of Labor Affecte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 Advanced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07/298.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Judzik, Dario & Hector Sala (2013). Productivity, Deunionization and Trade: Wage Effect and Labour Share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52(2).
- Lavoie, Marc & Engelbert Stockhammer (2013). *Wage-Led Growth: An Equitable Strategy for Economic Recove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OECD (2012).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2*. Paris: OECD Publishing.
- OECD (2017).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7*. Paris: OECD Publishing.
- Peck, Jamie and Adam Tickell (2007). “Conceptualizing Neoliberalism, Thinking Thatcherism”. In Helga Leitner, Jamie Peck and Eric S. Sheppard (eds.), *Contesting Neoliberalism: Urban Frontier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Piketty, Thomas (2014[2013]).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Stiglitz, Joseph 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Stiglitz, Joseph E.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Tickell, Adam (2006)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ransitions: Mutations through “Roll-back” Neoliberalism to Technocratic Fixes. In D. Conway and Nik Heynen (eds.), *Globalization's Contradictions: Geographies of Discipline, De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39-48.

Investigating the Falling Global Labor Income Share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Bih-Hearn Lee & Chyuan-Jenq Shiau***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auses of falling global labor income share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potential policy responses to this problem. It first identifies labor traps caused by market-openness strategies undertaken by states unde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flexible labor market reforms accompanied with new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de labor relations individualized and caused job flight. On the other hand, finance capital and financial crises affected employment recovery and growth. Secondly, the study analyzes global profiles of long-term falling labor share, including downward trends of labor share and real wages, as well as big increases in finance capital return compressing labor income share. It goes a step further to analyze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alling labor share, mainly globally persistent in-work poverty and greater social inequality, as well as overwhelming anti-neoliberalism movements by workers and social groupings. Finally, this article presents solutions to falling labor share and laborers' employment and poverty dilemmas which emphasize the pursuit

* Bih-Hearn Le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lbh@ntu.edu.tw.

** Chyuan-Jenq Shia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Examination Yuan. E-mail: cjshiau@ntu.edu.tw.

of equ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tions must not only move toward reform-style social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mocracy, but also need to provide overall maintenance of workers' abilities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s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Market-openness Strategy, Finance Capitalism, Falling Labor Income Share, Equ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